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与影响

科目编号: UASZ 3063

学生姓名: (英) CHUAH CHOON LOONG

(中) 蔡政龙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余曆雄 师

呈交日期: 15-4-2011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2
第二节 研究方法	2-3
第三节 论证架构	3
第四节 前人研究	4-6
第二章 杜甫的生活分期	6-18
第一节 壮游时期与功名仕途	7-10
第二节 战火噩梦	10-12
第三节 成都草堂与夔州时期	12-18
第三章 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	18-27
第一节 杜甫与陶诗的关系	19-23
第二节 杜甫对陶诗及陶渊明思想的接受	23-27

第四章 杜甫与陶渊明接受史在宋代的发展	27-33
第一节 宋代的政治风气与士人心态	27-30
第二节 苏轼的崇杜与慕陶	31-33
结语	34-35
参考资料	36-38

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与影响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8AAB05766

日期：15-4-2011

摘要

陶渊明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隐逸派诗人，其思想和诗歌创作都是后人争相模仿和钦慕的。从古至今，后人对于陶渊明诗歌和思想的研究都从未间断。唐代山水诗人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的诗歌，也深受陶诗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杜甫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功名仕途也满怀热诚。然而从其晚期的诗作所见，杜甫不但接受了陶渊明于诗歌创作上的技巧，而且还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吸纳、继承陶渊明的思想，为后世的陶渊明接受史奠下了一个不可重要的里程碑。

另外，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在宋代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盛行的“吏隐”文化，充分地将杜甫和陶渊明这两者的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一种“边仕边隐”的文化，除了追求杜甫忠君爱国的使命感，也让士人在仕途不顺利时，可以找到一个精神的慰藉。

苏轼作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其对于陶杜两者的接受却与一般的宋人不同。苏轼对陶杜的接受史是有阶段性的：早期崇杜、晚期慕陶。这与苏轼的仕途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本文主要以文史并重的方式论述，先讨论杜甫对陶渊明接受史的阶段性，并论述诗人对陶渊明接受史的贡献，再进一步讨论宋代对陶杜思想的融合。

关键词：杜甫 陶渊明 接受 影响 吏隐

致谢

在撰写论文期间，笔者确实遇到许多瓶颈与困难。所幸得遇一位学问渊博的恩师，以及不吝赐教的同学，才让笔者得以解决种种难题。

首先，衷心感谢论文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的悉心指导，非常感谢老师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所给予的引导、协助与鼓励。另外，也得感谢老师不吝于分享独到的见解，并慷慨地借出珍藏的书本，让笔者得以顺利地完成论文。笔者自问才疏学浅，从确立论文范畴至完成论文，皆得归功于余老师的指点与启发。

另外，感谢中文系同学们的关心与鼓励。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曾因陷入瓶颈而沮丧万分，他们都适时地给予动力和支持，使笔者重燃希望，继续撰写论文。当然，还得特别感谢陈美蓉同学为笔者的论文进行校对工作。此外，也非常感谢其他同乡的老朋友们，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

最后，感谢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家人和弟妹。感谢父母一直以来的关心与栽培，也感谢弟妹的乖巧懂事，让我在学习的路上无后顾之忧。对于各位的指导、支持与鼓励，笔者当铭记在心。谢谢！

第一章 绪论

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诗和固穷守志的思想，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杜甫作为唐代最具盛名的爱国诗人，其“忧国忧民”的形象及“沉郁顿挫”的诗风，也同样地成为了后世士人钦慕的对象。然而从杜甫晚年的诗作，却可以明显看出杜甫对陶渊明思想有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微妙之处。另外，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史也对宋代的士人有着重大的影响。

本文将论述杜甫对陶渊明其诗、其人的接受过程，并探讨宋代对两者处世精神与诗歌创作的融合，以此论证唐、宋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史。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对于陶渊明，后世对他的评价皆褒贬不一，新、旧《唐书》对陶渊明的隐遁行为更各持相反的看法。从诗歌创作到他独特的隐逸思想与行为，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开拓了众多的研究方法和领域。

杜甫作为“奉儒守官”的一位爱国诗人，一生都在为了仕途和效忠国家而努力，但是他晚年的诗作却可看见类似陶诗的闲适诗风，可见杜甫对这位思想与他背道而驰的诗人有着一定的接受。

本文着重考辨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尤其是阶段性的研究，以便更清楚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史奠下的贡献，并进一步了解陶杜二截然不同的思想，如何影响宋代的士人。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文史研究的方式，讨论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史，并进一步探讨其对于宋代陶杜接受史的影响。

诗人的创作往往反映了该诗人的现实感受和真实的生活境遇。一位成功的诗人不但可以深刻地描绘肉眼所见的现实景象，更可以将自己的处世理念和经验寓于诗歌创作内。对于外界所发生的事情，诗人将自己的情感注入诗歌或文章内，借此抒发自己对社会、政治、人生等方面的见解，让读者可以一窥他们的情感世界、感受他们的人生哲理。

笔者相信，一个文学作品的诞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定是作者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经历之下的产物。因此，历史背景的种种因素例如：政治局面、文化信仰、个人经历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文人的创作风格与题材。笔者参考了新、旧《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宋史》等资料，了解各个时代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以作出更准确的论述。

本文主要以杜甫不同时期的诗歌题材来分析诗人对陶渊明其人、其文的接受史，并探讨宋代文人对陶杜的接受和精神上的融合。另外，本文也参考了不同版本的杜

甫诗集，如《杜诗详注》¹、《读杜心解》²、《杜诗镜铨》³、《杜诗钱注》⁴，以便了解各个版本对于杜诗的评价。

第三节 论证架构

本文第二章将略论几位学者对于杜甫的生活分期以及各个分期的诗歌风格与题材，并尝试探讨不同学者所归纳的杜甫分期之共同点。杜甫终其一生都积极于政治，然而晚年经历了流亡的生活，诗歌的创作也有了陶诗的影子，故第三章将探讨杜甫对陶诗及陶渊明思想的接受。

杜甫学陶，其成就无非是陶学在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两者的人生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杜甫一生忧国忧民，甚至晚年仍存在着对时局纷乱的忧虑；反观陶潜则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但是，两者截然不同的处世理念正好符合了宋代盛行的“吏隐”风气。

本文第四章将探讨宋代的政治风气与士人心态如何构成宋人对陶杜二者的融合与平衡，并分析苏轼与宋代文人接受陶杜的差异点。追求“吏隐”的士人可以同时接受陶杜的理念，作为自己调谐仕隐矛盾的方式；而苏轼对陶杜的接受则是有着先后的秩序，并受到心态的转变所影响。

¹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² [清]浦起龙撰：《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2000。

³ [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⁴ [唐]杜甫撰，[清]钱谦益笺注：《杜诗钱注》，台北市：世界书局，1998。

第四节 前人研究

关于杜甫的生活分期，裴斐于《文学遗产》的〈杜诗八期论〉⁵把杜甫的经历和诗风分为八个时期：壮游时期、功名恶梦、辗转兵燹、奔逃陇蜀、栖息草堂、流离两川、羁留夔府及落魄荆湘。此文主要论述杜诗风格的形成和转变，也陈述了杜甫各个分期的诗歌数量。另外，莫砺锋于其著作《杜甫评传》⁶则把杜甫的生活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的放荡齐赵、旅食京华、中期的潼关诗兴、蜀道悲歌及后期的成都草堂和夔府孤城。此外，陈贻焮的《杜甫评传》⁷也尝试为杜甫的生活分期，但其分配则过于冗长。

现存关于杜甫的研究著作有《杜甫：古今诗史第一人》⁸、《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⁹、《杜甫传》¹⁰、《杜甫卷》¹¹、《杜甫叙论》¹²等，而与本文有直接关联的则有：《杜甫夔州诗疏论》¹³、《杜甫评传》、《杜诗详注》、《杜诗钱注》、《杜诗镜铨》等。另外，《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¹⁴还可以提供杜甫平生与友人交往的基本资料。

历代对于陶渊明的评价褒贬不一，其中除了因为各人的价值取向有别，也关乎当时社会背景对其隐逸行为的看法。撰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直对陶渊明隐居的

⁵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⁶ 莫砺锋撰：《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⁷ 陈贻焮撰：《杜甫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⁸ 萧丽华撰：《杜甫：古今诗史第一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1998。

⁹ 赵海菱撰：《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

¹⁰ 冯至撰：《杜甫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¹¹ 华文轩撰：《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

¹² 朱东润撰：《杜甫叙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¹³ 封野撰：《杜甫夔州诗疏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¹⁴ 陈冠明、孙懋婷撰：《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杜甫亲眷交游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举动甚为推崇，而撰于宋代的《新唐书》却认为隐逸的举动会让人丧失高尚的节操。这是因为五代时期是乱世，追求隐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而宋仁宗时期是太平盛世，追求隐居则会让人觉得另有目的。

从唐代开始到今天，人们对陶渊明的研究都从未间断。唐代颇负盛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如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都是以陶潜为他们的鼻祖。由于本文重点不在于谈论山水诗研究，故未有详细论述，更多资料可参阅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¹⁵，其内容主要论述唐代山水田园诗歌的特色以及山水田园诗派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

现存关于陶渊明的研究著作则有《陶潜评传》¹⁶、《陶渊明》¹⁷、《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¹⁸、《陶渊明传论》¹⁹、《陶渊明和他的诗赋》²⁰、《陶渊明年谱》²¹等，而与本文有直接关联的则有：《陶潜评传》、《陶渊明笺注》²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²³、《元前陶渊明接受史》²⁴、《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²⁵等。

¹⁵ 葛晓音撰：《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¹⁶ 李锦全撰：《陶潜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¹⁷ 梁启超撰：《陶渊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

¹⁸ 李剑锋撰：《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¹⁹ 李长之撰：《陶渊明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²⁰ 周振甫撰：《陶渊明和他的诗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²¹ 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6。

²²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²³ 罗宗强撰：《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²⁴ 李剑锋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济南：齐鲁书社，2002。

²⁵ 钟优民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对于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本文参阅了谭卓华的《從桃花源到浣花溪—杜甫對陶淵明精神家園的守望》²⁶、刘中文的〈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²⁷以及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²⁸。

张玉璞的〈“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行为〉，论述了宋代独特的隐逸文化——“吏隐”，论述了宋代人们对选择出世或入世的顾虑和担忧，进而演变成一种“边仕边隐”的文化。

另外关于苏轼的经历，则参考了《宋史》和《苏轼文集》，联合了文史研究的方法，探讨苏轼对陶杜的接受。

第二章 杜甫的生活分期

对于杜甫的生活分期，历来学者们都持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学者例如陈贻焮、莫砺锋、裴斐等人，都持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然而，他们对于杜甫的生活分期，仍然是大同小异的。

莫砺锋在其《杜甫评传》中，将杜甫的生活经历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的放荡齐赵、旅食京华；中期的潼关诗兴、蜀道悲歌；以及后期的成都草堂、夔府孤城。另外，裴斐于《杜诗八期论》则把杜甫的生活经历分为壮游时期、功名恶梦、辗转兵燹、奔逃陇蜀、栖息草堂、流离两川、羈留夔府和落魄荆湘八期。

²⁶ 谭卓华撰：《从桃花源到浣花溪—杜甫對陶淵明精神家園的守望》，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²⁷ 刘中文撰：〈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学术交流》，2005年第11期。

²⁸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此章将透过学者们对杜甫生活的分期，讨论杜甫各个生活分期的诗歌风格，并进一步探讨杜甫对陶诗在接受。

第一节 壮游时期与功名仕途

杜甫七岁就能作诗咏凤凰，年轻时曾经有过许多次出游的经历，我们将其称之为“壮游时期”²⁹。据莫砺锋《杜甫评传》，杜甫于二十岁时开始漫游吴越，历时四年。³⁰另外，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又开始了历时五年的齐赵之游³¹。由此可见，杜甫年轻时的性格是无忧无虑、豪放浪漫的。

陈贻焮也认为，这个时期的杜甫意气风发、自信十足。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骄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³²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捩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³³

其《房兵曹胡马》和《画鹰》豪迈而乐观，不止咏马咏鹰，更是借马借鹰言志。另外，这一时期的杜甫也写了一些惬意的诗篇如《题张氏隐居二首》、《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等，描写他游玩所见的景象。

然而裴斐却认为，这个时期的杜诗是属于“尚未形成的懵懂期”³⁴。杜甫的壮游时期与陶渊明少有关联，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品尝到人世的艰辛，缺少了一些

²⁹ 杜甫《壮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

³⁰ 《杜诗详注》云：“开元十九年辛未，公年二十，游吴越。”

³¹ 莫砺锋《杜甫评传》云：“开元二十四年，始游齐赵。”

³²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一，页18。

³³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一，页19。

人生历练。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杜诗尚缺少后期的“沉郁顿挫”，缺少了与现实人生的联系。

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其十三世祖杜预是晋镇南大将军，十世祖杜逊为魏兴太守、曾祖杜依艺为唐监察御史，而祖父杜审言和父亲杜闲分别任职武后膳部员外郎及玄宗袞州司马。³⁵身为官僚世家的后代，杜甫自然受到儒教影响，而早期的杜甫也十分积极于仕途。

天宝六年，唐玄宗“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³⁶。杜甫参加了这次的考试。然而却遭到李林甫从中作祟，使得应试的人无一及第，并上表贺“野无遗贤”。

此后，杜甫的生活开始窘迫。他开始向权贵投赠献诗，其中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丈济》等，但皆石沉大海。甚至在长安住了八年后，他已经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购买减价官米的地步。

杜甫经历了这一番生活上的剧变，觉得他的抱负和现实生活有所落差，开始变得愤懑不平，而他的诗歌也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其《醉时歌》云：“…儒术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³⁷

从这首诗看来，诗人似乎开始有了避世的思想，认为对儒术的追求是很难达到的。然而笔者认为这纯粹是诗人为了发泄满腔的愤懑而作，至少这个时候的杜甫，

³⁴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 29。

³⁵ 详见莫砺锋撰：《杜甫评传》，页 10。

³⁶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 6876。

³⁷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1 册，卷三，页 176。

仍然踌躇满志，只是壮志无从发挥，才会发出这样的牢骚。这一点可以从杜甫后来仍然致力于仕途看出来。然而，虽然这个时候的杜甫未全然接受陶渊明的思想，但的确有了学陶的倾向。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饮中八仙歌》³⁸，虽然八仙个个面带仙气，“共同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³⁹，但是这八个人的醉态并不是因为快乐而体现出来的。

程千帆于其文章〈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中提出：“‘饮中八仙’并非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之中。这篇诗乃是作者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饮者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杜甫与‘八仙’之间的关系何以归结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⁴⁰莫砺锋表示，这也意味着杜甫已经有从浪漫主义诗坛上游离出来的倾向。他的诗风不再像壮游时期时那么热情奔放，而开始有了转变。

对于这个时期的杜诗，裴斐的看法也与以上所述一致。杜甫“忧国忧民”的诗风，到了这个时期就开始明显了，尤其是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为杜甫诗歌创作的分水岭。他认为“自叹身世与忧国伤时乃是构成杜诗的两大基本内容”

³⁸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二，页81-85。

³⁹ 陈贻焮撰：《杜甫评传》，页121。

⁴⁰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页134-140。

⁴¹，而《赴奉先咏怀》这首诗更是表明了“其个人命运已与整个时代混融一体”⁴²，甚至“沉郁顿挫”的诗风也是由此开始表现出来的。

同时，他的诗歌也开始有了学陶的倾向。诗人于天宝十三年作了一首《九日寄岑参》⁴³，感叹“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仇注：淮南二句，当连下篱菊，盖用陶诗也。⁴⁴

由此可见，杜甫早年的抱负是明显倾向“致君尧舜”。他生活在奉儒守官的家庭中，儒家思想早已经根深蒂固地灌输在他的脑海里。《又示宗武》云：“…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⁴⁵另外，浦起龙亦云：“…孔门弟子，经术之准，故举以为法。…”⁴⁶可见儒教对杜甫的影响之深。

第二节 战火噩梦

天宝十五载开始，杜甫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日子。杜甫告别家人，独自赴京城当了三个月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又于五月携家小北迁避难。另外又于肃宗至德元年的逃亡期间遭俘至长安。

⁴¹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 31。

⁴²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 31。

⁴³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1 册，卷三，页 208。

⁴⁴ 《九日寄岑参》云：“淮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1 册，卷三，页 209。

⁴⁵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4 册，卷二十一，页 1850。

⁴⁶ [清]浦起龙撰：《读杜心解》下册，页 784。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⁴⁷

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未仓卒。⁴⁸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⁴⁹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⁵⁰

杜甫目睹国破家亡以及叛军的残暴、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困境，有感而发，写下了《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三《吏》、三《别》等代表作。其中《哀王孙》叙述的是安史之乱爆发时，皇室子孙的悲惨情景。此外，杜甫也运用了南朝梁武帝时的侯景之乱对比安禄山，表示其深恶痛绝。⁵¹

另外，《哀江头》亦描写了战争所造成的一片荒凉的景色。昔日的繁华景观已不在，虽然初生的细柳绿叶照常开放，却已无人欣赏。

杜甫经历了长安的腥风血雨，十分迫切地希望这场战争得以平息，这些诗歌不但体现了杜甫的忧国忧民，更是写出了平民百姓的心声。战争的发生，不但导致大量的人命伤亡、拆散了许多无辜的家庭，还让杜甫感受到了周遭草木鸟兽的惊心动魄。

至德二年，杜甫官拜左拾遗，后世称“杜拾遗”。但是，后来为了营救房琯而触怒肃宗，幸得宰相张镐所救。乾元元年，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并于乾元二年弃官而去。

⁴⁷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四，页314。

⁴⁸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四，页316。

⁴⁹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四，页310。

⁵⁰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四，页329。

⁵¹ 详见杨伦：《杜诗镜铨》上册，页120。

这一时期的杜诗，最大的变化在于“社会时事的淡化，诗人自己已成为其所描绘和咏叹的社会悲剧的主角”⁵²。诗人把自己融入生活所经历的情景当中，而非一味地以第三者的角度来描绘生活。当时的代表作有《羌村三首》、《北征》等诗歌。“…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⁵³和“…经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迴，悲泉共鸣咽。…”⁵⁴诗人的悲恸和无奈通过诗歌一同展现在读者面前。

虽然这一时期的杜甫经历过许多痛心疾首的事情，但他的诗歌似乎没有表现出类似陶诗一般的超然脱俗、意欲隐逸的倾向。由此可见，杜甫虽然深受国破家亡的影响而意志消沉，但仍然对国事念念不忘。然而，弃官逃到成都草堂后，杜甫的诗风却开始有所转变。他开始尝试一些闲适的诗歌创作，而且学陶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了。

第三节 成都草堂与夔州时期

乾元二年年底，杜甫一家终于到达成都，并于成都西郊的草堂寺寓居了三个月。次年，他在西郊浣花溪边建造了自己的一座草堂，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告一段落。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⁵⁵

⁵²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 34。

⁵³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1 册，卷五，页 391。

⁵⁴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1 册，卷五，页 395。

⁵⁵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2 册，卷九，页 729。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琳碍日吟风叶，筍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⁵⁶

从这两首诗歌看来，前者描写浣花溪边的景色；后者描写草堂内景，无比疏放，毫无一丝“忧国忧民”的感觉。

由上述诗歌所见，杜甫的心情似乎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得到相当大的转变。裴斐提出：“诗人所抒之情，也不再是以忧国伤时和自叹哀苦为主，而是以闲适与疏放为主。”⁵⁷类似此风格的诗歌还有《春夜喜雨》、《狂夫》、《为农》等。这些诗歌与前期的诗歌相比，变化十分明显。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但悠游，而且闲逸狂放。

“把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写入诗歌，在杜甫之前只有陶渊明作过尝试。”⁵⁸唐代的田园诗人如王维、孟浩然等人虽然也写了不少山水田园诗，但是他们的造诣却略逊一筹。王维的《山居秋暝》：“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以及孟浩然的《耶溪泛舟》：“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都是以第三者的角度去描绘所见的情景，无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更无法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

然而对于这一点，杜甫就可以处理得很好。他不但可以仔细地描绘周遭的环境，更可以达到陶诗的境界，将自己融入诗歌。

步履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⁵⁹

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⁶⁰

⁵⁶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九，页735。

⁵⁷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34。

⁵⁸ 莫砺锋撰：《杜甫评传》，页152。

⁵⁹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十，页804。

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⁶¹

由此可见，早期杜诗所见的伤春悲秋，都在他到达成都草堂后大量减少了。上述诗歌不但一摒之前腥风血雨、忧国忧民的风格，反而多了一股悠哉懒散的味道。

总的来说，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的诗歌都偏向于描绘日常生活的细节，而不是一味地发出忧国伤时的牢骚，这个时期的杜诗不但主题有所变化，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杜诗中属于柔美的风格也正是在这时期形成”⁶²。这一系列的变化最大的原因在于杜甫环境的转变，正如裴斐所说：“老杜创作最容易受环境影响。”⁶³更重要的是，“从安居于成都草堂开始，杜甫就和陶潜有了共鸣，而去到夔州后，这种共鸣就更甚强烈。”⁶⁴这个时期的杜诗已经明显地接近陶诗的风格，可说是杜甫对陶渊明接受史的重要里程碑。

大历元年，杜甫携家眷移居夔州，并在夔州居住了将近两年的安定生活。杜甫在夔州的两年共作诗四百三十多首⁶⁵，约占其全部诗篇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时期的杜诗主题多元化，而最引人注目的题材走向是“出现了大量的回忆往事和历史的作

品”，⁶⁶主要的作品有《壮游》、《遣怀》、《昔游》等。

⁶⁰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十，页816。

⁶¹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九，页789。仇注：“…此间春光欲尽，有傲睨万物之意。颠狂轻薄，是借人比物，亦是托物讽人，盖年华兴阑，不耐春事也。”

⁶²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35。

⁶³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35。

⁶⁴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页210。

⁶⁵ 此说取自莫砺锋撰：《杜甫评传》。另有裴斐于《杜诗八期论》提出：杜甫在夔州共约两年半，存诗470首。

⁶⁶ 莫砺锋撰：《杜甫评传》，页172。

杜甫在夔州的诗风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的内容，即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追忆自己所敬爱的当代优秀人物、反思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等。而在这个时期，杜诗对陶诗接受也越来越明显了。

《壮游》这首诗可谓是杜甫为自己所写的自传性诗篇。此诗对自己的生平作了相当详尽的回顾。不但记录了自己年轻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游记，也记叙了自己晚年时“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的不得志。

另外，杜甫也在《昔游》和《遣怀》中回忆了早年同行漫游的高适和李白、在《解闷十二首》中回忆了孟浩然、王维等人。“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墟。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⁶⁷此外，这方面最重要的作品首推《八哀诗》⁶⁸，纪念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璡、李邕、苏源明、郑虔和张九龄。

除了回忆挚友，杜甫的夔州诗也不乏一些回忆和反思唐代兴亡的主题。其中《诸将五首》就写出了战争(尤其是安史之乱)带来的困苦。《杜诗钱注》云：“…公诗标巫峡锦江。…曰正忆，曰往时，感今而指昔也。”⁶⁹他的诗歌“皆从地名叙起”⁷⁰，思绪扫过了广大的地域，而每一个地方都足以勾起诗人的阵阵哀伤。

此外，身在夔州的杜甫更感触地写下了类似《客堂》、《锦树行》等诗歌。由于长期的流离，而且自己也已经日渐衰老。诗人不由得写下了“居然绾章绂，受性

⁶⁷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3册，卷十六，页1448。

⁶⁸ 仇注曰：“…王、李名将，…继以严武、汝阳、李、苏、郑，…九龄名相，则怀贤。”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3册，卷十六，页1373。

⁶⁹ [唐] 杜甫撰，[清] 钱谦益笺注：《杜诗钱注》下册，卷十五，页786。

⁷⁰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3册，卷十六，页1372。

本幽独”⁷¹的诗句。此外，莫非蒙受了极大的打击和失望，诗人也未必会发出“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⁷²的感叹。

裴斐认为，杜甫的夔州诗是集杜诗之大成。“举凡浓淡、虚实、巨细、今昔、纪实与抒情、执着与超脱、…彼此辉映浑然一体，真可谓无所不备，亦无不登峰造极”⁷³。而莫砺锋也认为杜甫的夔州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⁷⁴。

对于杜诗的分期，虽然各位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意见。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各个学者对于杜诗的发展，都持有一项共同点，即安居草堂时期的杜诗开始，都有学陶的倾向。诗人不再一味地发出忧国忧民的感叹，而有些时候也会有“束带还骑马，东西却渡船”⁷⁵的闲情逸致，与陶渊明的“或命巾车，或棹孤舟”⁷⁶似乎心有灵犀。

张宏生认为：“压抑，是杜诗在夔州的重要内蕴。他个性的压抑，造成了感情的畸形，而思想上的压抑，又带来了诗歌格调上的苍凉。…从安居于成都草堂开始，杜甫就和陶潜有了共鸣，而来到夔州后，这种共鸣就更甚强烈。”⁷⁷我们不难发现到，晚期的杜诗格调都酷似陶诗。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⁷¹ 杨伦注：“言虽身被(披)章服而性爱山林。” [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下册，页586。

⁷²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卷二十，页1808。

⁷³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36。

⁷⁴ 莫砺锋撰：《杜甫评传》，页172。

⁷⁵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卷十九，页1635。

⁷⁶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433。

⁷⁷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页210。

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倾。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⁷⁸

正如诗中所见，诗人完全置身在赏花、观鸟、漫游的乐趣而陶醉万分，导致“回头错应人”，这种情趣完全是陶渊明式的享受，而其中的“读书难字过”也似乎取自陶渊明的作品。陶潜所著《五柳先生传》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⁷⁹杜甫的诗歌不再像早期般一味忧国忧民，反而多了一股闲适的风格。

另外，《遣意二首》亦云：“啜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酿黍，细雨更多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⁸⁰此诗不但字字透露出诗人轻松惬意的心情，似乎不再眷恋于世俗之物，而且其中“幽居不用名”更表达了其欲隐姓埋名的隐者心态。他处在跟陶渊明相近的生活环境，其思想感情自然很容易跟陶渊明相通。所以作起诗来，不觉就有点五柳先生的味道和派头，超然于物外，不与俗物为伍。

东晋盛行的玄学思潮，影响了大批的东晋士人。从玄学的基本品格而言，它在人生态度上有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⁸¹，以期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陶渊明身处的世道，无疑是促使他归隐的重大因素之一。眼见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甚至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悲痛，导致陶渊明选择了归隐田园。

⁷⁸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十，页797。

⁷⁹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502。

⁸⁰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九，页794。

⁸¹ 罗宗强撰：《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页272。

杜甫自小生长在官宦世家，早期积极于仕途，对国家有着极大的热诚。然而，对于陶渊明这种选择归隐的心态也不是完全否定的。甚至，杜甫晚年的诗作也受到陶渊明的影响。虽然杜诗是有明显的学陶倾向，但我们却可以看出杜甫学陶其实学得不太纯粹。接下来将探讨杜甫对陶渊明其诗歌及其思想的接受。

第三章 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⁸²，对于乱世，陶渊明选择了逃避。为了明志，陶渊明作了《归去来兮辞》⁸³、《五柳先生》等作品。他的作品明确地反映了他自己不愿拘泥于黑暗社会、追求人格上的自由的憧憬。甚至，他的隐逸诗里描绘的种种田园风光，无不包含着他对现实社会的虚伪、丑陋的斥责，而田园生活的朴实、真诚，才是他真正向往的安逸生活。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篇，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⁸⁴

陶诗《饮酒二十首》其十一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⁸⁵陶渊明认为，颜回身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一生遵守“仁”，却不幸英年早逝；隐士荣启期虽然长命，却“长饥至于老”。虽然他们死后留下美名，却一生憔悴、历尽沧桑。

⁸² [宋]朱熹撰：《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106。

⁸³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460。

⁸⁴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七，页563。

⁸⁵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261。

对此，杜甫也深有“观其著诗篇，颇亦恨枯槁”的感觉。对于陶潜的说法，杜诗也有为颜渊和荣启期感到惋惜的意味。杜甫的这一诗作，不但有借陶诗以自比的意味，同时也表达了他对陶渊明思想的认同和接受。

第一节 杜甫与陶诗的关系

杜甫和陶渊明生活的年代距离了大约 347 年，但是陶诗在许多年后仍然可以盛行于世，并且为许多诗人所接受和钦慕。由上所见，杜甫和陶渊明的抱负并非完全相同。然而唐代的时代风气，和两者相似的人生经历及情趣爱好上的相似，造成杜甫成为了研究陶渊明接受史不可忽略人物之一。

自古人们对于杜甫和陶渊明的了解，都给予两种不同的取向，一个入世、一个出世，然而陶杜在诗歌艺术中却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对于陶渊明的隐逸诗，杜甫却并不表示排斥，反而似乎有着一种共鸣。此外，陶杜二人的诗风也有着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陶渊明自古以隐士著称，钟嵘将其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⁸⁶。对于隐逸，新、旧《唐书》都持不同意见。《旧唐书》云：“…陶渊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之间，又其善也。…”⁸⁷对隐逸这一举动甚是推崇；然而，

⁸⁶ 王叔岷撰：《钟嵘诗品笺证稿》，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页 260。

⁸⁷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长春：吉林出版，2005，页 5115。

《新唐书》对此却持相反的看法：“唐兴，贤人在位众多，…然放利之徒，假隐其名，以诡禄仕，…高尚之节丧焉。”⁸⁸

对于陶渊明，杜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遣兴五首》其三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⁸⁹虽然杜甫不太赞同陶渊明退隐的举动，但是他却无法完全否定陶渊明。对于陶渊明，他仍然抱着一种敬仰和恨不相逢的态度。

陶诗的盛行其实和唐代的世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统治者非常尊崇隐士，唐代的诏令中，就有不少征召隐者的例子。唐肃宗乾元元年下诏：“草泽及卑位之间，有不求闻达，未经推荐者，一艺以上，恐遗俊乂。令兵部、吏部作征召条目奏闻。”⁹⁰代宗广德元年下诏：“河南河北，有怀才抱器，安真守节，素在丘园不仕，为众所知，委所在长官具名闻荐。”⁹¹这个现象促使唐代的文人、士人纷纷追风隐逸，造就了陶渊明诗文的盛行。他们或真心沉醉于陶渊明的写意生活、或希望以隐逸一举获得出仕的机会，使得“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作品得以盛行。

杜甫可说是陶渊明接受史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一般认为，杜甫和陶渊明对于人生的抱负是截然不同的。杜甫一生都在努力为自己谋取出仕的机会，然而陶渊明却向往田园生活而选择辞官。但是杜甫却因为生不逢时而在仕途上遭遇许多挫折。对于这艰苦的人生，他也曾经有过归隐的念头。其诗《可惜》云：“宽心应是酒，

⁸⁸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十八册，卷一百九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5594。

⁸⁹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七，页563。

⁹⁰ [宋]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页724。

⁹¹ [宋]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页725。

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⁹²可见杜甫晚年的人生，和陶渊明的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共鸣。此外，他也一直以自己的家世和祖先为荣，更受其祖父杜审言的影响，对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

除此之外，杜甫和陶渊明相似的生活经历也是杜甫接受陶渊明的因素之一。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官宦世家，从小就抱有大志。杜甫自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在仕途上有一番抱负。“他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⁹³，并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然而，杜甫的抱负在天宝六年就遭到了第一次的打击。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⁹⁴

对于权贵的玩弄，杜甫深感无奈和失望，并于是年写下《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表达了他的不满。其中的“…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⁹⁵就提到了陶渊明，标示着他开始和陶渊明有了共鸣。

另外，相似的生活情趣也是杜甫接受陶渊明的一个契合点。陶渊明的生活总离不开酒。他一生写下了无数的饮酒诗，对后来的爱酒之人和诗人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对于陶渊明的饮酒诗，杜甫给予很高的评价。杜诗《可惜》云：“宽心应是酒，遣

⁹²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十，页803。

⁹³ 莫砺锋撰：《杜甫评传》，页13。

⁹⁴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15册，卷二百一十五，页6876。

⁹⁵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一，页69。

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⁹⁶这首诗明显地表达出杜甫对于陶潜的钦佩和恨不相逢的感叹。杜甫往往借酒慰藉自己的心灵，通过作诗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这与陶潜是有相同之处的。

除此之外，热爱大自然也是杜甫接受陶渊明的另一个契合点。陶渊明曾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出了他对自然的向往。“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邱。”可见陶潜对于大自然的喜爱。对于大自然，杜甫也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自二十岁开始，杜甫就开始漫游吴越、齐赵、长安等地方，一生写下了许多歌咏大自然的诗歌，例如《春夜喜雨》、《望岳》等，其中较为世人称道的有作于765年的《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⁹⁷另外，其诗“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更表达了他对于陶渊明这位伟大山水诗人的敬佩。

另外，杜甫不拘小节的性格也和陶渊明极为相似。《五柳先生传》云：“…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对于待人的礼节并不重视，表现出他豪爽自得的一面。杜甫似乎也有着这种豪爽的性格。《新唐书》云：“…严武节度…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偏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⁹⁸

张宏生也认为“杜甫不能完全和光同尘，他偏要在已经注定了的悲剧结局里挣扎着去寻求对喜剧的憧憬这样，个性上和思想上的压抑，就使他的诗风苍凉多

⁹⁶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十，页803。

⁹⁷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3册，卷十四，页1229。

⁹⁸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十八册，卷二〇一，页5737-5738。

了。……”⁹⁹杜甫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对于他将自身致力于为民谋利的理念以及晚年对陶潜隐逸诗在接受，为陶渊明的接受史奠下了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第二节 杜甫对陶诗及陶渊明思想的接受

杜甫早期的诗作就频频提到陶渊明，可见他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是极为推崇的。杜甫早期雄心壮志，一心想为国家出力，造成他无法接受陶渊明的隐遁心态。然而这并不表示他无法接受陶潜的诗歌艺术，甚至，他对陶诗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欣赏的。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¹⁰⁰

“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间夜寥阒。”

101

自古以来，谢灵运是以山水诗而闻名于史的，而杜甫在此不但将陶渊明与其并列，更是“把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¹⁰²，还认为陶诗合乎《诗经》、《离骚》的儒家精神，对陶渊明的诗歌表示了极度的赞同和肯定。这是杜甫对陶诗的接受的初始阶段。

陶渊明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诗作中提到酒的更是多不胜数，其中最具盛名的莫过于《饮酒诗》。这明显表达了诗人对酒的喜爱以及酒对诗人作为消遣的作用。陶潜曾经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出了隐士们平时消遣的方式：读书、饮酒、

⁹⁹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页 214。

¹⁰⁰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2 册，卷十，页 810。

¹⁰¹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 1 册，卷三，页 246。

¹⁰² 刘中文撰：〈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学术交流》，页 149。

著文章。对此，老杜也似乎和陶渊明有着共同的爱好。陶渊明曾诗：“酒能消百虑”，而杜甫也心有灵犀地写过“一酌散千忧”的诗句。其中杜甫第一次提到陶渊明时，就与酒有关了¹⁰³。杜甫从秦州逃难避乱到达成都草堂，生活总算较为安定，心态也放松了许多。其诗《可惜》云：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汝后期。¹⁰⁴杜甫感叹欢娱之时已非壮年，而今只能靠酒和诗歌来排遣奇迹的愁绪。

除此之外，作为杜甫“接受”陶诗后的《羌村三首》，无疑继承了“陶诗之‘真’法抒写了如陶诗一般醇厚的体恤万物情怀”¹⁰⁵。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¹⁰⁶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¹⁰⁷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¹⁰³ “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唐] 杜甫撰，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一，页69。

¹⁰⁴ [唐] 杜甫撰，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十，页803。

¹⁰⁵ 刘中文撰：〈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学术交流》，页150。

¹⁰⁶ [唐] 杜甫撰，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五，页391。

¹⁰⁷ [唐] 杜甫撰，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五，页392。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¹⁰⁸

这一组诗不但描写了田家风光，还包含着诗人和农民对战争的恐惧与惆怅。正如上文所述，杜甫吸收了陶诗的风格，善于描绘细节，将自己融入诗歌，使人得以深刻感觉到诗人对社稷的关怀、对命运的感叹。

然而，杜甫亦并非一直处于郁闷不舒、为仕途感伤的状况。对晚年的杜甫而言，在他安居成都草堂之际，“他也能够安贫乐道，享受自己的田园生活。”¹⁰⁹正如裴斐所说：“老杜创作最容易受环境影响。”¹¹⁰杜甫晚年的诗歌不乏许多描写欢乐的诗歌，例如：“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¹¹¹、“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¹¹²、“旧犬喜我归，低回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需。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¹¹³这些诗歌无不描写老杜退隐时的欢乐，更表现出一种悠闲自得，超然物外的情趣。此外，这种诗歌的表现似乎比以前更为接近陶诗的风格。

然而，虽然杜甫往往可以作出极似陶诗风格的诗歌，但其诗歌却常常隐约透露出非陶潜一般的恬适。从一些杜诗里可以看得出，杜甫其实是不太愿意隐居的。

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栉，客至罢琴书。

¹⁰⁸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卷五，页393。

¹⁰⁹ 谭卓华撰：《从桃花源到浣花溪——杜甫对陶渊明精神家园的守望》，2011，页15。

¹¹⁰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页35。

¹¹¹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十，页798。

¹¹²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卷九，页793。

¹¹³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3册，卷十三，页1113。

挂壁移筐果，呼儿间煮鱼。时闻系舟楫，及此问吾庐。¹¹⁴

杜甫在夔州的创作虽然模仿了陶潜的风格，但他却不能真正与陶诗融成一体，因为他“做不到陶潜那样恬淡”¹¹⁵。从他的诗歌看来，杜甫是不愿意隐居的。陶潜于《归去来兮辞》里的“门虽设而常关”隐喻了他自己想与外界隔绝的意思，但反观杜甫的《过客相寻》却“挂壁移筐果，呼儿间煮鱼”，表达了他对客人的热情和期盼，他仍然希望有人可以常常到他家作客，让生活不至于枯燥乏味。

陶渊明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展现出其淡泊名利及自然纯朴。他这种精神劝诫世人在这社会上不应该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反而应当好好享受这大自然的生活，沉醉在这种美好的世界里。反观杜甫却在感叹“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其中的‘江山已定居’，又是带有多少的自嘲！”¹¹⁶那是一种既感慨又无奈的叹息。

虽然杜甫在仕途上遭遇了许多挫折，但他仍然无法放下心中的抱负，时时刻刻都想得到机会再度回到政坛上大展拳脚。他的恋阙心态是不言而喻的。与陶潜相比，杜甫生活上的选择似乎比较少。陶潜面对乱世，他选择了归隐田园，从此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写意生活。然而杜甫不但年少时仕途不如意，到了中年还得为了躲避战争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甚至到了晚年，他依然对他的抱负念念不忘。由此可见，杜甫的一生似乎与陶渊明息息相关。尤其在杜甫经历多次的贬谪时期，他的诗作更可以明显看得出陶渊明的影子。

¹¹⁴ [唐] 杜甫撰，[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卷十九，页1633。

¹¹⁵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页210。

¹¹⁶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页211。

杜甫对陶渊明的推崇，无非是陶学在历史发展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宋代文人如苏轼、王安石、王禹偁都对杜甫的诗歌推崇有加，而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也影响了宋代的文人对陶渊明的看法。接下来将谈谈陶诗在宋代的发展。

第四章 杜甫与陶渊明接受史在宋代的发展

从杜甫学陶的举动来看，可见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史，更对后世的陶渊明接受史起了重大的影响。为了论证这一点，本文必须以更大的历史背景来论述。宋代的重文轻武以及王安石、苏轼等宋代著名文人的推崇，都和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史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一节 宋代的政治风气与士人心态

对于陶渊明的隐逸，新、旧《唐书》都给予不同的意见。由于时代风气的不同，前者处于盛唐时期，故不甚推崇隐逸的举动；后者则对陶渊明于动荡的政局选择隐遁的举动甚为推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陶渊明所创作的隐逸诗、文，为后代诗人开创了更广大的创作视野，更为隐逸诗和山水田园诗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

欲谈陶诗在宋代的发展，必须先稍微论述宋代的独特隐逸文化——“吏隐”。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¹¹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¹¹⁷ [宋]朱熹撰：《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页163。

¹¹⁸、“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¹¹⁹。自古以来，出仕或隐遁的问题经常困扰着士人。这看似两个极端的走向，但张玉璞认为：“‘隐’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退避策略。一旦显示社会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环境，那么士仍然希望在现实社会中有所作为”¹²⁰，这和杜甫的政治情怀似乎很一致。虽然杜甫一生的仕途并不顺利，但是他对政治的抱负是十分热诚的。和“吏隐”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杜甫是为“吏”而“隐”，始终无法“吏隐”并行。

北宋初年赵匡胤确立“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到文人与士大夫受到广泛的重用而迅速崛起，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起，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谏论倡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¹²¹。士人们无不表现出他们践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

在这种政治局势之下，杜甫作为“忧国忧民”的忠君形象代表，自然受到了宋代文人的推崇。王安石《寄蔡天启》：“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

¹¹⁸ [宋] 朱熹撰：《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页 95。

¹¹⁹ [宋] 朱熹撰：《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页 106。

¹²⁰ 张玉璞撰：《“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文史哲》，2005 年第 3 期，页 48。

¹²¹ [元] 脱脱等撰：《列传第二百五》，《宋史》卷四百四十六，第 38 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13149。

东岗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¹²²章培恒认为：“杜甫晚年的诗，常把自我的形象孤零零地置于肃杀的秋色中，以表现心境的悲凉，王安石这首诗与之有些相像，包括声律的顿挫也有些相似。”¹²³甚至在宋代诗人的笔下，杜甫忠君爱国的形象更是进一步被放大。王安石《杜甫画像》：“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¹²⁴

然而另一方面，朝廷为了防止文官专权，又设立了御史台与谏议院。前者“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¹²⁵；后者则“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¹²⁶。严谨苛刻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到官吏们在仕途上必须步步为营、战战兢兢，才能保住自己的俸禄，不至于落得朝不保夕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隐逸又似乎是士人得以自保的方式。然而，选择隐逸也必须考虑到一个切身的问题。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¹²⁷自古人们皆离不开衣食住行，然而一但选择了隐逸，也就同时意味着失去了政府提供的经济和物质保障。正如陶渊明所面临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缊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¹²⁸一样。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宋代诗人既想与现实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又想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不为外物所役、

¹²²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词》第10册，卷五六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6696。

¹²³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页352。

¹²⁴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词》第10册，卷五四六，页6537。

¹²⁵ [元]脱脱等撰：《志第一百一十七》，《宋史》卷一百六十一，第12册，页3869。

¹²⁶ [元]脱脱等撰：《志第一百一十四》，《宋史》卷一百六十一，第12册，页3778。

¹²⁷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页266。

¹²⁸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433。

获得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于是，边官边隐、似出似入的‘吏隐’便成了他们调谐仕隐矛盾、求取适意人生的最佳方式。”¹²⁹

据王水照于《宋代文学通论》中对《文苑英华》和《唐文粹》类目中的整理，宋代的诗歌题材可分为：自然景物、自然生物、岁时节气、人文景观、社会政事、人际交往、士人日常生活。¹³⁰可见宋代的诗歌多趋于平淡、平易的题材，故此与陶潜的诗风颇为相似。

另外，根据《册府元龟》的记录，杜甫和陶渊明出现的次数分别为七次和十三次，可见宋人对陶杜两人的重视。杜甫的忧国忧民、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虽然他们两人对现实社会的看法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却同时被宋人所钦慕，这无非是因为陶杜适应了宋诗发展中对和谐精神的追求。当他们仕途得意时，杜甫忠君的形象成了他们追求的境界；然而当他们仕途失意时，陶潜的避世和闲适的生活也可以为宋人提供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虽然“吏隐”是宋代士人追求入世与出世的一个平衡点，他们可以同时接受陶杜两者完全相反的精神与情怀，但并非所有士人都是如出一辙的。宋代著名的文人苏轼对陶杜的接受，就是感受了两段不同的经历，才由崇杜转向慕陶。

¹²⁹ 张玉璞撰：〈“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页 50。

¹³⁰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页 390。

第二节 苏轼的崇杜与慕陶

苏轼作为宋代继欧阳修之后，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对陶杜的接受史也是远远超过其他宋代文人的。其中与追求“吏隐”的文人之不同点在于，苏轼早期和其他文人一样受到环境的熏陶，致力求仕，故对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情怀表示认同，更高度推崇杜甫的人格。然而后来成了政治斗争底下的牺牲品，经历了“乌台诗案”以及贬谪黄州的苏轼，对仕途似乎兴致缺缺，转而“独好渊明之诗”。由此可见，苏轼对于陶杜的接受是有阶段性的，与追求吏隐的文人有所差别。

先前提过宋人同时接受陶杜，皆因当时的吏隐之风的盛行。苏轼的一生把陶渊明和杜甫这两个各别属于“独善”型和“兼善”¹³¹型的诗人都推崇到极高的地位。然而前人对陶杜的接受往往仅止于两者诗歌艺术的造诣，甚少联系陶杜的为人作出评价。杨胜宽认为：“陶渊明与杜甫的真正价值是在宋朝被完全认识的，这与苏轼对其深入发掘和评价分不开”¹³²。苏轼对陶杜其人格与诗歌的联系来定位两者的价值，其对于陶杜接受史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其他宋代文人。

“…嘉祐二年，试礼部。…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¹³³苏轼早年和宋代文人一样，受到环境和政策的熏陶，把考取科举、获取功名确立为人生的目标。嘉祐二年，

¹³¹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宋]朱熹撰：《孟子章句》，《四书章句集注》，页351。

¹³² 杨胜宽：《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页101。

¹³³ [元]脱脱等撰：《列传第九十七》，《宋史》卷三百三十八，页10801。

苏轼所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¹³⁴获得主考官梅圣俞和欧阳修的青睐和赞赏，并因此中了进士。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一书中曾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¹³⁵另外，苏轼于次年所作《上梅直讲书》¹³⁶更充分表明了苏轼考中进士时的确满怀政治抱负，他迫切希望为国家改革而出力的决心和杜甫十分相似。他早年强烈的政治意识，使到他对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时时刻刻为民着想的情怀表示认同，并对杜甫“兼善”型人格高度推崇。苏轼于《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云：“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¹³⁷对杜甫表示极高的评价。另外，苏轼也于《王定国诗集叙》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¹³⁸对苏轼而言，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但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是最受钦佩的。

神宗元丰二年，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御史…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¹³⁹苏轼的政治生涯受到“乌台诗案”以及贬谪黄州的灾难后，在黄州“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¹⁴⁰更在后来陆陆续续写下许多和陶诗词。

苏轼于《与苏辙书》中直接把陶潜置于李、杜等人之上，并形容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可见他对陶渊明是十分钦佩的。

¹³⁴ 参见[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3-34。

¹³⁵ [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与梅圣俞》第三十一则，《欧阳修全集》第6册，卷一百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2459。

¹³⁶ 参见[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十八，页1385。

¹³⁷ [宋]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240。

¹³⁸ [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册，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318。

¹³⁹ [元]脱脱等撰：《列传第九十七》，《宋史》卷三百三十八，页10809。

¹⁴⁰ [元]脱脱等撰：《列传第九十七》，《宋史》卷三百三十八，页10809。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鸟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¹⁴¹

这首词不但直接将陶潜寄予词中，更表现出词人对隐遁丘园的向往和欢愉。苏轼希望效仿陶潜自行耕种以糊口，更描绘了大自然山水的壮丽，希望可以在山水中畅游，以度余生。另外，他也于《送曹辅赴闽漕》¹⁴²里表达了自己“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的隐遁心情。

总而言之，苏轼早年政治意识强烈，故特别推崇杜甫；晚年饱经政坛沧桑与险恶，转而对陶渊明十分敬仰。苏轼作为宋代继欧阳修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对陶杜的接受史除了有赖于苏轼当时的名气，更值得重视的是苏轼对于陶杜的处世精神的发掘。

¹⁴¹ 邹同庆、王宗堂撰：《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352。

¹⁴² [宋]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第4册，卷三十，页1505。

结语

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僚世家，导致他深受“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影响，十分积极于仕途，想为人民与国家出力。杜甫第一次于天宝六年参加了由唐玄宗号召的考试，不幸成为奸臣阴谋底下的牺牲品。经过一连串的挫折，杜甫从一个壮志满怀的有为青年，沦落为向权贵投赠献诗，希望觅得一官半职的贫民。他经历过生活上的剧变，第一次有了学陶的倾向。

天宝十五载开始，杜甫先后上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左拾遗等职位，却又遭到战乱和贬谪的灾难。杜甫萌起了隐居的念头，并于乾元二年年底抵达成都草堂，结束了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个时期的杜诗开始有了明显的学陶倾向。杜甫的诗风从本来的忧国忧民、沉郁顿挫，渐渐变为闲适与疏放的风格。后来抵达夔州后，杜甫的诗歌更难见到雄心勃勃的诗风，反而愈加接近陶诗的风格，甚至带有“读书难字过”的慵懒格调。

陶杜两人都喜爱大自然。陶潜自从归隐田园后，就经常过着“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¹⁴³的生活，而杜甫正值壮年时就时常漫游远行。另外，他们也同为爱酒之人。陶渊明的饮酒诗多不胜数，其爱酒之情不言而喻；而杜甫也曾作过“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汝后期”的感叹。

然而，相似的人生经历与志趣并不代表杜甫对陶潜思想的接受。前文提及杜甫仕途失意之时，曾发出“儒术与我有何哉？”的牢骚，但由后来他仍然积极于仕途

¹⁴³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460。

的举动来看，杜甫始终无法放下自己对国家的使命感。就算到了晚年，他的诗作也在“回忆往事，反省那些事实的成败是非，对家国之事进行历史性总结。”¹⁴⁴

宋诗发展中对和谐的追求，以及当时盛行的“吏隐”文化，无疑使到陶杜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处世理念的诗人在宋代得到一定性的“融合”。杜甫忧国忧民的形象为士人所钦佩；而陶渊明闲适的隐逸文化也受到追求人格自由的士人的推崇。在这个“边仕边隐”的文化下，杜甫对国家的使命感成了宋人追求的一个典范；而陶渊明的隐逸，也提供了宋人一个精神寄托。

苏轼身为宋代最杰出的文人之一，先后接受了杜甫和陶潜的思想和诗风，并将陶杜的处世精神推崇到一个更高的地位，使到后来的陶杜接受史得到更好的发展。这除了有赖于他在当时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将宋代的陶杜接受史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总而言之，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除了源自相似的生活情趣，更重要的是他在仕途上的连番波折，使到杜甫必须寻找一个精神的寄托，才转向学陶。另外，陶渊明的隐逸诗也启发了杜甫对生活上的追求，也可以转向对文学艺术的造诣。本文限于所论范围，故暂截止于元代以前。

通过对这篇论文的研究，笔者对于杜甫和陶渊明的思想和诗风都有了更深的了解 and 认识。另外，此研究过程也启发了笔者对古人思想和创作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根据这种研究方式，未来可向“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史”、“唐宋人对陶渊明接受史的差异研究”等类似论题的方向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¹⁴⁴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页 220。

参考书目

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词》第10册，卷五六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陈冠明、孙懋婷撰：《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杜甫亲眷交游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陈贻焮撰：《杜甫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撰：《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唐]杜甫撰，[清]钱谦益笺注：《杜诗钱注》，台北市：世界书局，1998。
7. [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 封野撰：《杜甫夔州诗疏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9. 冯至撰：《杜甫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10. 葛晓音撰：《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11. 华文轩撰：《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
12. 梁启超撰：《陶渊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
13. 李长之撰：《陶渊明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4. 李剑锋撰：《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5. 李剑锋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济南：齐鲁书社，2002。
16. 李锦全撰：《陶潜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 [后晋] 刘昫撰：《旧唐书》，长春：吉林出版，2005。
18. 罗宗强撰：《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19. 莫砺锋撰：《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0. [宋]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21.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 [清] 浦起龙撰：《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2000。
23. [宋] 苏轼撰、[清] 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4. [宋] 司马光编撰，[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25. [宋]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26. [宋] 苏轼撰、[明] 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27. 谭卓华撰：《从桃花源到浣花溪——杜甫對陶渊明精神家园的守望》，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8. [元]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
29. [宋]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30. 王叔岷撰：《钟嵘诗品笺证稿》，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
31.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32. 王质等撰、许逸民 校辑：《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6。

33. 萧丽华撰：《杜甫：古今诗史第一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1998。
34.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35.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6. 赵海菱撰：《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
37. 钟优民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38. 邹同庆、王宗堂撰：《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39. 周振甫撰：《陶渊明和他的诗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0. 朱东润撰：《杜甫叙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1.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期刊论文

1. 刘中文撰：〈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学术交流》，2005年第11期。
2. 裴斐撰：〈杜诗八期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
3. 杨胜宽撰：〈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 张玉璞撰：〈“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文史哲》，2005年第3期。